

偽四屆「人代」後的毛共外交

尹慶耀

研究毛共外交，應以毛共文件為依據，如果單靠支離破碎的新聞報導來個「憑天斷」，是不够現實的。然而要做到現實，可也并非容易。

美國布魯金斯(Brookings)研究所高級研究員D·奈特(A. Doak Barnett)於一九七三年四月八日在紐約時報星期雜誌上發表過一篇文章，標題是「深一層想，中共也有缺點」。文中說：「美國人觀察中共問題，常常好以己當時之好惡而貿然下筆」。他指出：「最主要的兩國間對於問題的處理，最好是要從現實主義下手，不能單靠希望，這才是正確的途徑」。

這些話是對的。其實，受好惡和希望所左右的，何止是美國人。譬如，對於四屆「人代」後毛共的對外動向如何這一個問題，自由世界人士所作的推論，很多都不是以毛共自己的文件所載明的政策作依據，那當然不是一種正確而有益的態度。

共黨的黨綱黨章，是最基本的政策性文件。自由世界的政黨中，可不一定都有這些，因而研究共黨問題的專家，常常會把它忽略掉，那是一件憾事。但是，憲法在自由世界是相當受重視的，人們研究毛共今後的外交動向，却忽略了毛共四屆「人代」通過的新「憲法」、張春橋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以及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外交政策的部分，委實令人大惑不解！

本文試就毛共政策性文件分析毛共今後的對外政策，並把它簡化成以下幾個要點來說明，當然會掛一漏萬的。

首先提出的是，誰是毛共對外政策路線的決定者？答案：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毛澤東。

我們說過去是，是根據毛澤東自己的說法。一九六七年王力和姚登山等在毛共「外交部」大門陳毅，九月間毛澤東對這個問題有個批示，其中說：「對外路線是我制定的，周總理執行的……」。

我們說現在是，是根據毛共的新「憲法」和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中的說法。外交政策的執行，是「國務院」的職責，而根據新「憲法」第十七條的規定，「國務院總理和國務院的組成人員」，是要「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提議」，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任命的，而毛共中央委員會的主席就是毛澤東。此外，第十五條規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帥全國武裝力量」。第十六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另據外電報導，毛共已將「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都置於毛共中央軍委直接管轄之下，而中央軍委主席就是毛澤東。我們可以說，整個四屆「人代」、整部新「憲法」的精神，就在把「黨權」置於「國權」之上，又把「毛權」置於「黨權」之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難設想毛澤東會把對外政策路線的「制定」權，「下放」給什麼人。更何況新「憲法」第二條已明文規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國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難道什麼政策路線，敢於違反毛澤東思想？把這寫進「憲法」條文，如果說其用意是，毛澤東生前由毛澤東親手制定那些政策路線，毛澤東死後由毛澤東思想指導那些政策路線，想來並不為過。因此，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聲言：「我們要繼續執行毛××的革命外交路線」，那是實話實說，我們不能指它是假的，更不能因

爲毛澤東不會出席四屆「人代」，就說他已經失勢。

跟着來的第二個問題是，這個受毛澤東思想指導并經毛澤東自己制定的對外基本路線又是什麼呢？

新「憲法」序言裏說：「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着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這些矛盾，只能靠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來解決」。

顯然，毛共的內外政策是互相配合、彼此一致的。它以階級觀點看國內事務，也以階級觀點看國際事務，對內對外都要繼續革命。

這裏，我們提出的第三個問題是，在毛共的階級觀點下，它對當前的時代特徵如何體認呢？這最好還是拿毛共自己的話來說明。

一九七三年八月，周恩來在毛共「十大」所作的「政治報告」中說：「毛××經常教導我們：我們仍然處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迄今，毛共的觀點並無改變，而且它也不是從毛共「十大」時才開始。不過，從「十大」前後起，毛共就更號召加強關於帝國主義理論的學習。就以毛共理論雜誌「紅旗」說罷，一九七二年第六期（六月一日出版）有史軍署名的「讀一點有關帝國主義的歷史——三談讀一點世界史」；一九七三年第九期（九月三日出版）有常謙署名的「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前夜——學習『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九七四年第三期（三月三日出版）有辛風署名的「反修鬥爭的强大思想武器——學習『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九七四年第四期（四月一日出版）有方岩梁署名的「大有大的難處——從『紅樓夢』看反動沒落階級的虛弱本質」，這篇文章不是研究「紅學」，其目的在強調「今天蘇修、美帝兩個超級大國，大則大矣，但外強中乾，困難重重而無法擺脫，在這一點上，倒是很像『紅樓夢』中的榮寧二府」，這是毛式「古爲今用」的反帝文章。同一性質的文章，當然還不勝枚舉，而不上上述諸文爲限。

這樣看來，毛共所謂對外的繼續革命，實際就是反帝革命。

反帝又如何反法呢？那首先就是利用矛盾。

毛共的帝國主義論是學自列寧。周恩來在「十大」政治報告中說：「列寧……對帝國主義作了科學分析，認爲『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指出，帝國主義使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極端尖銳化」。這些尖銳化的矛盾是什麼呢？上述史軍的文章中，引用毛澤東「矛盾論」中的說法，那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激化了，獨占資本和自由資本之間的矛盾發生了，宗主國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即由各國發展不平衡的狀態而引起的矛盾特別尖銳地表現出來了。史軍所引的這些話，是毛澤東早年根據列寧的理論寫出來的，這裏可歸納成三種矛盾，那就是：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毛共中央向蘇共中央提出的「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①中所說：資本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被壓迫民族同帝國主義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壟斷資本集團同壟斷資本集團之間的矛盾。

毛澤東在「矛盾論」裏說：「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例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去解決；……殖民地和帝國主義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戰爭的方法去解決」②。還有帝國主義國家相互間或壟斷資本集團相互間的矛盾如何解決呢？毛澤東當時沒有明說，但共黨在其他場合則屢加強調，那就是用列強自相殘殺的帝國主義大戰來解決，以使它們嚴重地削弱。

毛澤東關於世界矛盾的分析學自列寧，而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成於一九一六年，發表於一九一七年春，當時世界上還沒有共產政權，所以列寧當時注意的是三大矛盾。迨至蘇維埃政權出現，情形就不同了，因此中共「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就還有一個社會主義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連同以前共四大矛盾。這兩大陣營的矛盾又如何解決呢？這就牽涉到共黨世界革命的戰略問題，其原則應該是利用一切矛盾削弱敵人，利用一切機會壯大自己，在量變質變的辯證過程中逐步爭取優勢地位，以求最後壓倒敵人。

共產政權的對外政策就屬於戰略範疇③，它應該是配合其世界革命戰略的，因此，中共「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就明白宣稱：「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總路線，在我們看來，應當包括下列內容，即：在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下，發展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之間的友好互助合作關係；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支援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這三項內容，是互相聯繫、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的。

一九七二年八月五日，日本「每日新聞」在一篇標題為「中共的外交戰略——堅守原則，隨機應變」的文章裏指出，毛共政權成立以來，其對外政策的原則是：(1)與社會主義國家加強團結；(2)和平共處（有條件）；(3)支援解放鬥爭。迄今從未改變過④。這種說法是大致不錯的。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劉少奇在毛共建黨四十週年紀念會中的講話，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林彪在毛共「九大」中的政治報告，所提到的毛共對外政策，都很清楚的和「關於國際共產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所說的完全一致，只是劉少奇的「友好合作」對象中有蘇聯字樣，林彪又把它一筆勾銷。

正因為對外政策路線是毛澤東制定的，所以劉少奇垮台影響不到它，林彪被整也影響不到它。一九七三年八月廿四日周恩來在毛共「十大」的政治報告中，明白肯定了「九大」的對內對外政策路線，並且說明當年林彪在「九大」宣讀的，是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的政治報告，它當然不會因林彪死亡受到影響。至於周恩來在「十大」的政治報告和四屆「人代」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把對外政策三原則分散開來不再一起連續講，那是美毛勾搭後毛共對外策略和姿態的轉換，不是政策原則和基本路線的改變。

三

林彪在「九大」報告中提出的四大矛盾，就是「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的四大矛盾，他只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解釋裏加了個修正主義國家，在帝國主義國家行列中加了個社會帝國主義國家而已。周恩來在四屆「人代」報告中，用「世界各種基本矛盾進一步激化」一句話帶過，這基本矛盾是什麼？實質上仍然是根據列寧帝國主義論演化而來的四大矛盾，矛盾激化就正好掌握運用，而運用的原則就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⑤。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鄧小平在聯大關於原料和發展問題的第六屆特別會

偽四屆「人代」後的毛共外交

議中，當眾提出毛共「天下大亂」的輪調，他說：「這個『亂』是當代世界各種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表現」。那麼這個亂就是帝國主義時代應有的特徵，毛共應該助長這個亂，利用這個亂做反帝鬥爭。鄧小平說：「在『天下大亂』的情勢下，世界上各種政治力量經過長期的較量和鬥爭，發生了急劇的分化和改組。一系列亞非拉國家紛紛取得獨立，在國際事務中起着愈來愈大的作用。在戰後一個時期內曾經存在的社會主義陣營，因為出現了社會帝國主義，現已不復存在。由於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西方帝國主義集團，也已四分五裂，從國際關係的變化看，現在的世界實際上存在着互相聯繫又互相矛盾的三個方面，三個世界。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三分世界乃是毛共過去「中間地帶論」另一形式的翻版，它的企圖不變，但在運用範圍和技巧方面，也有一些不同。

從六〇年代起，毛蘇由分歧走向分裂，由非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走向對抗性的「敵我矛盾」，而毛共加給蘇聯的稱號，也由修正主義變成了社會帝國主義。因而，過去只有「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的敵人」，如今這個敵人除資帝外更加了個社帝⑥。鄧小平在聯大說：「只要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存在一天，這個世界就決不會安寧，就決不會有什麼持久和平，不是它們相互之間打起來，就是人民起來革命」。毛共隨時希望美蘇之間打起來，蘇聯不斷指責毛共挑撥美蘇戰爭，都是事實。就帝國主義論而言，那正是解決四大矛盾之一——帝國主義國家相互間矛盾的應有方式。

自然，毛共三分世界的主要目的是分化「帝國主義集團」，而孤立美蘇。鄧小平把「處於超級大國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達國家」歸入第二世界，並指出「它們當中的一些國家，至今還對第三世界國家保持着各種不同形態的殖民主義的關係」。那麼它們原應屬於帝國主義集團。但鄧小平又說：「同時，所有這些發達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這個或那個超級大國的控制、威脅或欺負，其中有些國家在所謂『大家庭』的幌子下，實際上被超級大國置於附庸的地位」。如此一來，毛共就利用它們和「超大」之間的矛盾，把它們列入「聯合」的「多數」之中，成爲其統戰的對象了。這裏附帶說明的是，近年來毛共已不太強調「三反」中的「反各國反動派」，那不是放棄，而只是適應縮小打擊面的統戰需要。正如同毛共不會把第二世界國家當作

真正的朋友一樣，它對各國反對與毛共接近的政府或民間人士，仍然是要以反動派目之，並相繼予以打擊的。

毛共不斷渲染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誇大先進國家內的罷工人次，那是資無兩大階級矛盾的利用。然而，毛共在這方面的影響力小，儘管它不會放過任何可資利用的機會，但它的真正着力點不在於此。

毛共一貫注重的是被壓迫民族和帝國主義的矛盾，要以第三世界代言人的姿態，達到實質上作亞、非、拉及其他地區發展中國家盟主的目的。通過民族革命步向社會革命，從而奪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鄧小平在聯大說：「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中國屬於第三世界。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一貫遵循毛××的教導，堅決支持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鬥爭，這是我們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這本是毛共的一貫鬥爭方針，迄今仍未改變，只是鄧小平在聯大面對一百幾十個國家的眾多代表發言，其影響就不回了。

四

毛共一方面利用矛盾作反帝鬥爭，一方面偶而也對帝國主義擺擺笑臉，並把這稱為毛澤東的革命外交路線。但革命外交路線的意義為何？毛共并不作詳細解釋，因為那不需要自由世界知道得太詳細，因此我們就得根據毛共自己散見各處的理论和其實際作為來求了解。

首先，革命外交的最終目的是革命，是世界革命。雖然毛共指稱「革命和戰爭的因素都在增長」，但它更強調「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⑦。其對外一切活動，都以為這種革命創造有利形勢為目標。

其次，革命是不變的目標，但要達成革命，據利寧說是：「可以走直路，也可以走彎路」^⑧。毛澤東則說：「世界上沒有直路，要準備走曲折的路，不要貪便宜」^⑨。走彎曲、迂迴的路，使敵人誤認為「溫和」「理性」「現實」而自己不失其目標，也是革命外交的特徵之一。

復次，與政府建交或正常化，却着眼於人民，也是革命外交的一大特色。在公開的資料中，毛共說毛澤東是把一個國家的政府和人民加以區別，在

這個區別上建立政策^⑩。史諾曾經公開報導說：「毛總是注意把各國人民同其政府的政策區分開來」^⑪。他也報導毛曾表示「中國人和美國人之間無需有偏見」。「他將寄希望於美國人民」^⑫。在毛共的內部文件中，話可就說得不那麼含蓄了。譬如說毛澤東邀請尼克森往訪是「着眼於人民」。「如果你不和他（尼克森）談，你就進不去，你的影響就到不了美國。什麼做人民的工作，宣傳馬列主義都不好辦。毛××邀請尼克森訪華這一英明決策，打開了我們同美國人民往來的大門，影響了美國人民」^⑬。等等。參考了這些，回頭再看周恩來在四屆「人代」報告中所謂：「我們要繼續執行毛××的革命外交路線，着眼於人民，寄希望於人民，把對外工作做得更好」。就不能等閑視之了。當然，像毛共所說：「現在我們的影響已經進到美國了，只要我們耐心積極地做工作，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會同美國革命運動的實踐結合起來，加速美國革命的進程」^⑭。如果你認為毛共立刻會明目張膽地這樣做，而且會馬上收到巨大的效果，那固然是不對的，就是毛共自己也不敢如此奢望；但如果你認為毛共只是口頭說說，根本不會這樣做，那將是更嚴重的錯誤。尤其是民主根基不如美國者，更不可在對毛共勾搭方面抱有任何幻想。

另外我們要提到的是，革命外交的特徵更表現在「又聯合又鬥爭」的兩面手法上。在周恩來的報告中，對蘇聯的語氣比較嚴厲，然而他也「奉勸蘇聯領導，還是老老實實坐下來談判」。事實上，蘇聯的首席談判代表伊里切夫也於最近返回北平。周恩來聲言三年來毛關係有所「改進」，希望可以「繼續得到改善」，但他也不會忘記強調「兩國之間存在着根本分歧」，那是在「聯合」的同時，揭示「鬥爭」的依據。當他把美蘇放在當前（時間）這個世界（空間）上時，就更鼓吹「資本主義世界面臨戰後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世界各種基本矛盾進一步激化，一方面是世界人民的革命向蓬勃發展，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一方面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爭奪世界霸權越來越激烈。它們的爭奪遍及世界各個角落，爭奪重點在歐洲，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是聲東擊西。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是當代最大的國際壓迫者、剝削者和新的世界戰爭策源地。他們的激烈爭奪，總有一天要導致世界大戰。各國人民對此必須有所準備」。如此說來，美蘇乃是歷史中的逆流，同處於黑暗面、沒落面、和各國人民對立的一丘之貉

。這讓我們相信毛共內部文件中所說：「我們面前有兩個敵人，一個是美帝，一個是蘇修。這兩個敵人我們都要打倒，這是新黨章上明確寫了的。但是，是不是兩個都用同等的力量一塊打呢？不是。是不是聯合那一個打那一個呢？更不是。我們是根據形勢的變化，在不同時期有所側重。但是側重打擊點應當放在那一個，怎樣利用他們的矛盾，這是需要很高超的策略水平的，利用得當與否，是決定世界命運的大問題」^{①5}。這些話都是真的。邀請尼克森往訪，是這種策略運用之一，但那并不顯示側重打擊點永遠固定在那一方面，更不可能從毛共語氣的如何而察知。

周恩來說：「世界上到處講緩和、講和平，恰恰證明，這個世界沒有緩和，更談不上什麼和平。目前，革命和戰爭的因素都在增長，不論是戰爭引起革命，還是革命制止戰爭，國際形勢總是朝着有利於人民的方向發展，世界的前途總是光明的」。這表示毛共不希望世界上有和平，也不希望美蘇之間有和解。周恩來又說：「第三世界是反殖、反帝、反霸的主力軍」。在目前，毛共所謂新老殖民主義，所謂資帝社帝、所謂超級大國和霸權主義，實際上都是指美蘇二國而言，它們同是要反的目標，而第三世界是反的主力。既然「中國（毛共）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屬於第三世界」（周語）。難道它不也屬於主力軍？不會企圖做這主力軍的盟主嗎？在毛共看來，美蘇兩霸相爭，必有一戰，而第三世界就應該起來革命，以革命制止戰爭。因此，周恩來對外號召「各國人民對此必須有所準備」。對內則強調「保持警惕，加強防禦，準備打仗」。至於第二世界，周恩來在報告中對西歐、對日本都以緩和的口吻提到。四屆「人代」後，周恩來對日本前自民黨幹事長保利茂，暗示日本對美關係的重要，對西德基督教社會同盟主席史特勞斯則稱：「美國的防衛力量，對西德而言實屬必要」。這些都是迎合對方原有的立場與主張（既然毛共現今不能改變它）所作的順水人情，藉以博取統戰所需的好感。依我們看，今年五月鄧小平訪法時，沒人保證他不挑撥英法乃至美法之間的感情。如果毛共派人訪問拉丁美洲，他唱的調子又必然與上述種種不同。

綜觀周恩來所提出的口號與論點，以及他對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不同態度，就毛共所謂帝國主義時代的戰略部署與策略運用而言，乃屬邏輯上的必然，沒有什麼稀奇之處。

如上所述，所謂革命外交并非一味對人怒目相向，有時倒可以笑臉相迎。當然，藏在心底的目的和企圖是不變的。四屆「人代」仍以周恩來蟬聯「總理」，以喬冠華任「外交部長」，這項人事安排本身就含有這種用意。說毛澤東是政策制定者，周恩來只是執行者，是有根據的（見前），而且史諾也有過同樣的看法。他說：「要說明他們兩人（毛周）的關係，『共生共棲』這個詞語可能是最好的了。毛和周在作風和個性上很不相同，在三十七年信任和相依的基礎上，他們像兩人前後坐的叫腳踏一樣相輔相成」。「周歡迎巨細無遺地執行計劃（它使毛感到厭煩），……他是一個營造師，不是一個詩人」。「周同尼克森總統談判時，在和居於幕後的毛密切合作下，可能做着實際的工作，而最後的決定將由毛作出」^{①6}。

以共黨的性格言，說毛周是真誠合作頗有疑問，但就二者決策與執行的關係言，史諾的說法是不錯的。讓我們重複一些話，就現況言，毛未出席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代」，并不足以證明他失勢。在「新憲法」中，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權力已凌駕乎國家之上，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已明定於「新憲法」第二條之中，而且一部「新憲法」實際就是毛澤東思想的制度化，不論他出不出席，沒有人能動搖他的地位。即使他死後，如不把這部「憲法」徹底換過，那大陸就仍然在他的思想支配之下。

在四屆「人代」前後，周在醫院裏七月之久，并不妨礙他接見重要外賓（包括季辛吉在內，認為他健康不惡）；在四屆「人代」期中，能够出席作冗長報告，但會後却又做「住院總理」，看來也不像在內爭中得勢的樣子。不管是出於自願或被動，周恩來當前的任務，像是育幼院裏的保姆，作坊裏帶徒弟的師傅，在為毛共培養下一代的接班人。打個比喻說，對內言，周恩來是中國農曆春節住宅大門上的門神，要把大鬼小鬼都擋在門外，保護着宅內主人的成長，可是自己也不能升堂入室（無法進入毛澤東或文革派的權力核心）；對外言，他是日本話中的「看板娘」，時時要擺出笑臉，以廣招徠，但他不是商店的決策者，却也幫着店主在顧客身上撈取點什麼。他可不是西方人心目中的得勢者或溫和派。他這次在四屆「人代」中的「政府工作報

告」，比之一九七三年八月他在「十大」的「政治報告」，語氣上（包括對蘇聯的語氣）是溫和多了，但就對外政策實質言，二者又有什麼差別？原則上堅定，策略上靈活；內心狠，表面和，正是革命外交的妙用。

毛共現今對印度對東協各國，都在施展兵兵外交，預料它在世界各地還要繼續其反帝鬥爭的兩手策略，以低姿勢達成高目標，而且以煽動原料資源鬥爭的方式，造成經濟上的「天下大亂」，以世界經濟危機導致世界政治危機，逐步向其最終目標前進。

毛共的近程和遠程目標，都不會對這個世界有利。我們對於毛共的對外動向，不能只靠大胆的假設，更重要的是小心的求證，才不致為自己的幻想所欺！

註釋：①「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乃中共中央對蘇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來信的復信，刊同年六月十七日「人民日報」，並於七月二十日重刊。

②「矛盾論」發表於一九三七年八月，引文見「毛選」一卷，二九九頁

③請參閱一九五八年九月中共根據蘇聯教授庫達科夫(L. N. Kutakov)在「北京國際關係學院」教課時的俄文講稿譯印的「現代國際關係史」序言。

④乃該報連載稿「北京以後」的第六篇。

⑤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廿五日毛澤東「論政策」中語，「毛選」二卷，七六〇頁。

⑥資帝社帝之說，請參閱一九七四年第三期「紅旗」刊辛風「反修鬥爭的強大思想武器——學習「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文。

⑦此語出自一九七〇年五月廿日毛澤東反美聲明「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毛共迄今仍一再引用。

⑧列寧著「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一九六〇年毛共「人民出版社」版「列寧全集」第九卷，二一頁。

⑨毛澤東「關於重慶談判」，「毛選」四卷，一一六二頁。

⑩一九七一年中共「紅旗」雜誌第九期刊載「中國共產黨湖北省委員會寫作小組」文章：「團結人民戰勝敵人的強大武器——學習「論政策」」。

⑪見史諾在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八日出版的義大利「時代」週刊上發表的

「我們同毛澤東談了話」。

⑫見史諾著「漫長的革命」第二十四章「同毛澤東的一次交談」，陳雲翻譯，一九七三年六月香港「南粵出版社」版，一八三頁。

⑬一九七三年四月四日毛共昆明軍區政治部宣傳部編印之「形勢教育參考材料」第四三號「連隊形勢教育提綱」第三課「毛××革命外交路線的偉大勝利」。

⑭全右。

⑮全右。

⑯「漫長的革命」第二十五章，一〇九、二〇〇頁。

本所出版匪情叢書

- | | |
|----------------------------|------|
| 一、共匪文教問題論集 | 四十元 |
| 二、共匪經濟問題論集 | 四十元 |
| 三、大陸知識份子問題論集 | 四十元 |
| 四、匪黨問題論集 | 四十元 |
| 五、從馬克思、列寧到毛澤東
——毛澤東思想探源 | 二十五元 |
| 六、中共外交與對外關係 | 四十元 |
| 七、中共的文藝整風 | 六十元 |
| 八、共匪文字改革總批判 | 四十元 |